

一代論宗哀榮餘墨

# 一代論宗哀榮餘墨

## 目錄



一、一代論宗哀榮餘墨·····

二、張季鸞先生·····

·····一

·····七四

## 一代論宗哀榮餘墨

陳紀澄

### —敬悼張季鸞先生逝世三十一周年—

「天下慕正聲，千秋不朽；崇朝絕永訣，四海同悲。」

——蔣委員長輓張季鸞先生

報人張季鸞先生的言行事功，歷久彌新。今當他逝世滿三十一周年之際，我特編著這篇小文，一方面是彌補我前著的不足，另一方面也藉此喚醒世人對新聞事業的重估。我們這些年來，大眾傳播事業是發達了，人才也衆多了，但是為什麼還找不出一位風格嶄峭、曠世驚俗的大手筆來？其故安在？看看這篇小文的內容，能給您些許啓示，也未可知。——作者識。

內容摘要：一、話說從頭。二、噩耗傳來中外震驚。三、「悼季鸞先生」。四、唁電雪片飛來。五、重要悼念文：(一)于右任悼文。(二)曾琦悼文。(三)蔣蔭恩悼文。(四)王文彬悼文。(五)李俠文悼文。(六)章士釗輓詞。(七)朱蔭龍輓詞。六、社祭祭文。七、國府褒揚令。八、渝市公祭。九、各地公祭。一〇、餘墨贅言。一一、夢幻將來。

## 一、話說從頭

一代論宗名報人張季鸞先生，於民國三十年九月六日逝世於抗戰首都重慶郊外歌樂山中央醫院。以年序計算，去年（辛亥）恰為季鸞先生逝世後三十週年，今年（壬子）則是滿三十一週年祭。上年秋，正當我籌備赴愛爾蘭出席國際筆會，瑣務蜩集，竟沒能夠安下心來寫這篇文稿。今年再無法託詞了，但歉疚之情，仍充滿內心，本文倘能贖罪

於萬一，誠然是幸事。

十五年前，也就是民國四十六年九月六日，拙著「報人張季鸞」出版，以紀念季鸞先生逝世十五週年。出版前，曾由于右任氏題詩；出版後，又由他老人家在青田街官邸為我邀集監察委員朱宗良、立法委員冉寅谷、王廣慶、審計部長蔡屏藩、國大代表楊爾瑛先生等，一方面為拙著出版祝賀，另方面這些位先生不是季鸞先生的好友，就是同鄉。如朱委員乃是當年右老在上海創辦「民立報」時，季鸞先生的同事。冉、楊兩氏都是榆林人，與季鸞先生同里。我當時曾表示，我這本小書，僅是對一位長者崇敬的象徵，十分草率而簡陋，希望將來有機會，再寫一本較完整的傳記，以補不足。

當時，就由右老及朱委員把他們在「民立報」時季鸞先生的情形，娓娓描述；冉、楊二公又把早年榆林城內景象，為我敘說一遍，我都加以筆記。其餘在閒談中，從新聞

界前輩如蕭同茲、成舍我、許孝炎及程滄波諸先生口中，也增加了不少資料。相信假如我給季鸞先生經營一部較完整的傳記，仍有可能。

可是，我現在還不敢作此嘗試。因計劃中要寫的東西太多，要閱讀的東西更不少。一天二十四小時，除去睡眠、吃飯、必要的開會、必要的應酬，實在可利用的時間無幾，所以我不敢說什麼時候，可完成這樁心願，但盼有生之年，不辜負右老與朱委員在天之靈，不枉費他們化費半天的時間，為我講述他們當年的快事，為一代論宗增添姿彩。

「報人張季鸞」出版後，曾蒙各大專新聞系指定為課外參考書之一。十五年來，已印行三版，每版兩千冊，已有五六千冊，與書賈翻印之「季鸞文存」，同時流行於海內外，不管對「大公報」輝煌時期瞭解的正確資料，尤其對一位具有歷史影響的報人，更增深崇敬。

近二十餘年來，我每天閱讀臺灣刊行的所有報紙，目觀印刷之改良、編排之新穎、取材之廣泛與副刊影響力之大，與抗戰前後之報紙相比，誠然已有不可估量之進步。但若以言論影響及新聞報導而論，究竟比技術優越了多少，則不能不存疑待問。特別是言論立場、時事分析，跟那份愛國思想所昇華的動人感情，大公報真是絕無僅有，歷久彌新。我常常這樣想：當年季鸞先生那枝筆的所以感人，不僅是反映了他的學識與修養，却也顯示了他的真摯、勇敢、正義與遠見的品德。他那娓娓動人的分析、大氣磅礴的主張、真知灼見的觀察跟處理問題的犀利，不但是言論界空前的巨人，就是求之現在，恕我孤陋，我還不知哪位先生堪與匹配！

所以每逢國家有大事發生時，我常想假如季鸞先生還健在，他要怎樣評論這件事？每逢有需要注入感情的文章時，我也常想，若是季鸞先生在，這篇文章一定寫得動人心

弦。可知學技術易，學修養難；寫通順了容易，寫能發生影響力難。今天大專新聞系的課程，大部份屬於知識性的，很少涉及「眼光」與「心胸」這類學問，故難以培養出真正傑出的記者；膚淺的報導太多，深入的寫作過少。

且說我的小書出版後，供職臺南鹽廠的周維亮先生曾把當年季鶯先生去世後有關剪報寄給我。這些資料保存在我這裏已達十五年之久。當接到時，看一看都是當時親自閱過的記載，不過是報導一些消息及一些悼念的文字，為季鶯先生增加哀榮而已。那時也沒有機會把它介紹出來。十六年後，張氏逝世三十一年屆滿，重讀這些資料，便覺得不祇是一個報人的哀榮，一樁事的記載；更反映着一個時代的背景與國人對新聞事業的期望。至於從字裏行間，尋繹某些道理與追溯某些情節，這些哀榮文字，更提供了一些重要參考資料。所以我樂意詳盡地介紹於後，聊補拙著「報人張季鶯」的不足，又可使當年在

## 二、噩耗傳來中外震驚

重慶的朋友，特別是懷念抗戰情景的國人，多一番「憶往」情緒，或者啓發一點什麼思想。至於在臺降生的青年才俊，這裏面所記述的一切，當成一篇歷史看，豈不也值得嗎？

張氏於民國三十年九月六日晨四時三十分逝世後，次日（七日）渝市大公報首先發佈消息如下：

「本報渝、港、桂三板總編輯張季鶯於六日晨四時三十分在重慶中央醫院逝世。臨終時有其家人在側。即日下午四時入殮，到有蔣委員長代表陳布雷及于院長右任、吳秘書長鐵城、黨社長同慈暨本報渝館同人，成喪。聞弔日未定。蔣委員長曾於五日下午五時半，親臨中央醫院探視。」

又刊出貴陽六日中央社電：

「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鶯氏逝世消息傳來，適該報總經理胡政之抵渝，對記者談：『本人於十五年前與張氏

及吳達詮先生接辦大公報，張氏主持筆政，辛勞特甚。抗戰後，張主持漢、渝版，余主持滬、桂版，晤而甚難。今春在滬相約秋間來筑與吳暢敘，並商本報今後計畫，不料此願未償，而張氏勞瘁。余在桂接辦，即急欲飛渝，候機多日，迄未成行，乃改乘郵車赴筑，遠聞噩耗，愴痛良極！現惟明（七日）晨赴渝，主持治喪事宜。」記者復憶吳達詮先生（是時吳氏正任黔省主席。作者註。）『張氏逝世，不憐好友傷心，皆為國家重大損失，張氏畢生選擇新聞事業，論其成就，應足自慰。惜數年來為抗建而努力，天不假年，竟不及親觀勝利之來臨，當不無遺憾耳。』又筑新聞界王亞明、董蔚民、嚴懷予等，均電張氏家屬致唁。」

桂林大公報七日刊登消息如下：

「本報總編輯張季覺先生在渝逝世，消息傳來後，同人莫不悲悼，除即電慰家屬外，並訂今（七）日下午二時一天，全體聚餐一日，並停止報業，以誌哀思。明（八）日下午七時至九時在本報工廠舉行追悼會，本報全體職工，均將參加。」

同日中央社向全國各報發佈張氏略歷全文：

略歷：「大公報總編輯張季覺氏，名鑑章，原籍陝西榆林，生於山東鄒平，年五十四歲。十五歲由魯赴陝就學，旋赴留學，辛亥返國，任民立報記者。元年臨時政府成立，一度任秘書，不久仍入報界。二年與賈成甫（大公報總編輯賈魯谷冰之文）創辦「京津民立報」。五年袁死，黎元洪繼任總統，復北上主「中華新報」

筆政。八年，主辦上海「中華新報」。越三年，復北上。十五年與吳達詮、胡政之接辦天津「大公報」。二十七年任第一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本年連任第二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氏豪爽，結青年氣，平生盡力報業，以忠勇自知，所論忠於主張，而極採多方見解，故論點不可移易，而絕無偏見；以維護失敗為辦報秘訣，故勇於發表，敢直言之，不附合，雖逆當局意見，不合社會空氣，苟真理所在，則力爭不改。凡此於「大公報」社論之見重海外，足以知之。平時於他人意見各力情報，耳目所及，鉅細不遺，益以深思熟慮，乃成其大。其學力之淵博，為同輩所推重，一時名流如于右任、陳布雷諸氏，則交好尤篤焉。氏於學術宏遠之外，雅嗜崑曲，酒酣耳熱，引吭高歌，豪興至老不減。氏夙病肺，積勞至今，疾乃加甚。近居南岸御園，終無起色，復患肋膜炎，醫告不治。近數日，因呼吸困難，曾注氧氣數次。五日下午，蔣委員長會蔣院長探視。臨終前，于右任、陳布雷、蕭振瀛諸氏，同作遺囑聲明人；而此報界巨子竟擱筆而長殞，此非獨報界之損失，亦國家民族之損失也。六日下午四時大殮，親友臨窆者，有于右任、吳鐵城、王世杰、陳布雷、甘乃光、潘公展、許孝炎、陳博生、蕭同茲、康心如、康心之等五十餘人。靈柩停滬郊某地，俟秋涼移葬原籍。各界聞訊，深為哀悼，擬於日內舉行追悼會。」

又各報均刊佈張氏遺囑全文：

遺囑：余生平以辦報為唯一之職業。自辛亥以還，無時不以籌畫記者天職自勉，期於國族有所貢獻。迨九一八事變後，更無時不以驅除敵寇，恢復我國之獨立自由為目的；同時並深信必須團結一致，擁護領袖，擁

謹政府、忠貞自勵、堅苦奮鬥，始能達此目的。故嘗易勉我同人，敬懼將事，努力弗懈。今屆抗戰第五年代，勝利在望，而余病勢將不起，特重言之；並願我全社同人，痛感時令之艱難，責任之重大，本此方針，一致奮勉，務冀全功；尤宜隨時注意健康，以積極精神爲國奮鬥。至關於余子女教養及家人之生計，相信余之親友必能爲余謀之，余殊無所悲懷，不贅言。」證明者于右任、陳布雷、甘乃光、蕭振瀛、王凡生、康心如、康心之、王陸一、陳博生、邵毓麟、王家曾、蕭同茲、曹樹銘、王玉珍、張陳筱俠、屈武、王芸生等。記錄賈谷冰。

筆者按：曹谷冰兄就是簡歷中與季鸞先生在北京共同創辦「京津民立報」曹成甫的哲嗣。谷冰兄浦東高橋人。自上海同濟大學畢業後，赴柏林主攻經濟。歸國後就供職大公報。因其頭腦清晰、文字簡練、賦性耿直、處世有方，深得季鸞、政之兩先生的器重，一進館就畀予最高位置。「大公報」傳統，除三位創辦人外，誰擔任要聞版的編輯，誰就是編輯部的最高負責人。彼時「大公報」並無有總編輯、副總編輯及編輯主任之名。連一般職員也並無臺銜，僅是負責某一部份職務而已。以作者而論，先後服務該報十

五年，從來沒接到過一張聘書及稱呼我是什麼。承他們不棄，一會兒命我去採訪，一會兒教我編副刊，裏裏外外，許多難差都幹過，到頭來，我並無任何名義。谷冰、芸生等都是如此。包括季鸞先生，他所擔負的工作，豈是一位總編輯所能勝任？當年老一輩人不重名位，只擔責任的情況如此。谷冰兄於十九年隨莫德惠氏訪問蘇聯，歸後著「蘇聯視查記」，爲蘇聯十月革命後，我國新聞記者正式入蘇採訪的第一人。那本書暢銷多年。

我於二十二年夏自東北秘密採訪回津後，即被挽留在報館編輯「小公園」及「本市新聞」，彼時谷冰兄與許葦伯兄正分任二、三版要聞編輯。當時「大公報」第一版刊登「社評」，二版國內要聞，三版國外要聞。特別欄（關欄或邊欄）分刊二三版。三版還有「短評」。因爲那時各大報不習慣刊登中央通訊社的電訊，全靠本社專電與外電（路

透、哈瓦斯、德通、美聯及電通社等。）尤其「大公報」特派員遍全國，每天接到自外埠拍來的專電不下數千字，都需要審慎處理，稍一疏忽，就惹麻煩。所以當時要聞版編輯的責任比後來不知重大若干倍。「大公報」的特別欄為成功要素之一，全國專家學者都樂意藉該報發揮高論，見重於世；「大公報」也藉這些專家們的議論，提高報格，相得益彰，一時無兩。這些特別欄的文章也需要負責聞版的編輯核閱。寫短評及替季覺先生作「社評」末校，也是他倆的責任。有時候，往往由季覺先生授意，還要寫「社評」。其餘各版有了什麼問題，也由谷冰與董伯二人共謀解決。他倆還輪流看大樣。實際上，他倆所作的事情，是今天主筆、總編輯及編輯主任的職務。可是那時都沒有這些名堂，只是埋頭作事而已。據我所知，季覺先生名片上從無頭銜，他死後加上「總編輯」之名，還是新聞界根據在內政部報紙登記，「大公報」遵循成例填註的名銜稱呼他。「大公報」剛創辦時，以「新記有限公司」為財團代表人。有一個時期，推吳達詮為社長。吳從政後撤銷。

如果說吳、張、胡三位是大公報的創辦人，則曹谷冰、李子寬、（國聞通信社負責人及駐上海特派員）金誠夫、許董伯及王芸生是第二輩。在第二輩人中，無論學識、資歷與關係，谷冰實為首。而且以他的氣度，實在得到季覺先生的衣鉢，應為接棒之第一人。他也是以主持編輯業務而遷升為經理的首位。

「大公報」不居名位的傳統既如上述，另一個傳統，則是由「外勤」到「內勤」，由「內勤」積資升為「要聞」版的負責人。再由「要聞」版升任業務經理，不似今天報社這樣「分工」之精，但也沒有「倖進」之弊。我倒覺得「大公報」的制度在那時非常有道理。報業在今天是企业，企业管理要精要細，一切靠專門知識。過去報業是「文人

論政」，重言論影響，輕業務經營。大公報之所以成功，則是「言論」與「業務」並重。每一業務人員必須首先瞭解文字的影響力，所以「編而優則經」是很有道理的。當一個人知道了「工作疾苦」再去主管那相關業務，一定比沒有經驗的好得多。瞭解了報紙的基本動向，再去管社裏的柴米油鹽，則輕而易舉。

我認為「大公報」成功要素之一，便是這種制度。舉例言之，胡政之先生若只是位經理人才，「大公報」則絕不會有那段輝煌時代，因為胡氏是從採訪新聞、撰寫社評等編輯業務內熬出來的，所以他才有報業經營的方法。季鸞先生與胡氏等竭誠合作，也是徹底明瞭報業經營的最高原則，共同信守而獲致的。

金誠夫、李子寬兩先生都是經理好手，分任過上海版與天津版的經理。但曹谷冰兄則擔負了抗戰時期最艱苦的一段任務，功勞最大。

由於上一代與張氏的關係，而他個人又是才學都高、穩穩自守的人，谷冰兄接受季鸞、政之兩先生的信賴可以說獨多。所以這篇「遺囑」由谷冰兄記錄，自是正理。當時一般人認為谷冰兄在張、胡、吳三氏之後，領導羣倫，擔負「大公報」的繼承任務，是毫無庸懷疑的。

我個人於二十二年與曹氏結交後，承他不棄，對我十分看得起。在天津時，曾有多次聚首談心，後來在武漢，彼此相知愈深。重慶八年，有一個時期，因大轟炸，我也搬進公園下宿舍與他同住，更多談天機會。我幾次艱難採訪為報館賺來的一些浮譽，與我在金錢上的不苟，承他不時提起，常使我汗顏無地。有一次，張志淵女士寫的一篇童話，文內把「陛下」都寫成「陞下」，我一時疏忽，沒有看出；而校對先生依樣畫葫蘆，也沒改正。於是滿篇「陞下」。第二天，谷冰兄問我：「這個錯誤怎麼來的？」我坦然

承認是自己的過錯，當編輯的應該負責，不可推托「手民之誤」或「未能校正」等等。我至今想起這樁事來，深感歉然。谷冰兄於日理萬幾之餘，他每天還一字一句地尋找報紙上的錯誤，以提醒同人的注意。可知任何事成功並非偶然。關於他我要說的還多，暫「按」到這裏。

### 三、「悼季鸞先生」

季鸞先生逝世次日，渝、桂、港兩版同是刊佈以「悼季鸞先生」為題的社評，全文如下：

本報渝港桂三版總編輯張季鸞先生，本患肺疾，近忽轉肋膜炎，遽而入重慶中央醫院治療，卒以積勞成疾，瘵石同效，於昨晨溘然長逝。噩耗傳來，同人悲痛萬分，謹投數言，以誌哀思。

季鸞先生之死，不僅是本報的損失，也是中國新聞界的損失，更是整個國家的損失。季鸞先生從事新聞事

業，有三十餘年的歷史，自「民立報」起至十五年前與吳達聲及胡政之兩先生合作接辦本報津版以迄本報桂版誕生為止，他辦報的主張，精神和高情，數十年如一日。陳布雷先生近在「讀書通訊」（第二十一期）撰「一個新聞界舊人之自身經驗談」，將季鸞先生列為新聞界良友之一，其文有曰：「張季鸞先生被時在中華新報，其報館處境甚困，設備甚簡，報紙推銷少不得力，較之商報尤過之；但季鸞先生絲毫不放鬆，熱情積極，興趣濃厚。余在商報，平均每日十篇文八篇，季鸞先生則每日有一篇論文，眼光四射，論旨周延，從不作護駕之文，亦絕無敷衍之作。彼之論文，余日日讀之。彼之至神貴注，余更心儀之。至今追思，余當時得有尺寸成就，皆賴有良友在前，雖幫助亦不能不自奮也。」布雷先生的話，是將季鸞先生早年辦報的主張、精神和熱情，作一個深刻的描繪；而在今日，季鸞先生作報的主張、精神和熱情，與昔日相比，不獨沒有些微的減退，反而更進步，更奮發，更積極。本報今日所以能在國內外報壇擢獲虛聲，至少有一半是季鸞先生心血的結晶。他主持本報肇啟以後，十五年來，不斷努力，力求改進，始終不懈。在立言方面，他主張寬厚淵博，為民喉舌。清末他贊助革命，民國他促進統一，抗戰後他更呼籲團結；有時為了構思一篇文章，往往廢寢忘食，偶有所得，甚至深夜披衣而起，擲管疾書，這種對職務的熱誠，非一般人所能企及。抗戰以來，他對國家前途，關切愈恆，每聞好消息，輒高興萬分，而時局稍顯晦澀，往往獨坐沉思，終日不發一言，實際他已因大我而忘了小我，這種對國家的熱情，也非一般紙上談兵者可比。他對抗戰建國大計，常有獨特見解，所以蔣委員長不時召見，垂詢一切，而他也能本其所知所見，忠實表示意見，但決不阿諛奉承。本年五月十五日他在陪都新聞界慶祝本報接受蔣委員長與蔣章會中致答詞時稱：「本報擁護領袖，擁護抗戰國策，但可隨言決非盲從。本人近年雖

在病中，仍時時研究國家民族最高利益所在，並準備假若有一天關於國家重大問題與政府意見衝突，同時認定以發表爲有利於國家，則將甘受處分而先表之，且決計在淪虜處分，而不逃避。」這可代表他作報的一貫精神，也可以表示他對國家的忠貞。

季覺先生從事記者生涯三十餘年，潔身自好，始終不渝。他對新聞學，有著深刻的認識，不移的信念，尤其具有中國民族傳統的節操觀念。他個人以報爲終身職業，抱定不作官不求利宗旨，而盡其文章報國之責。他民二爲反袁曾被捕入軍法庭，但他與舊勢力奮鬥的精神，却經此而愈堅。他對編輯新聞，素主正確與忠實，而尤注重微小之處，雖一字一句，都不肯馬虎；也常以此勉勵本報青年同事，咸謂報人天職，爲不望成功，準備失敗，且須能忍辱，忠即忠於主張，勇則勇於發表。他在本年五月十五日陪都新聞界慶祝會中，曾列舉二義，勸勉青年記者，就是：（一）立言記事，以國族利益爲先，遇重要問題，須有犯顏諍議，不惜與當局衝突的決心；（二）不阿諛社會空氣，即報無人買無人看，亦不稍屈。這是每個報人都應具有的精神。而季覺先生就是以這種精神奮鬥了三十餘年的成功報人。本報改版創刊後，他曾以「老兵」的筆名，爲桂版寫通信；對於「老兵」的意義，他曾有這樣的解釋：「我在新聞戰場上打了三十幾年，已是一個老兵，但仍願以老兵的資格，領導新兵作戰；在戰場上，老兵的地位，比新兵重要，因此可以證明，我是愈老愈勇，並沒有後退的意思。」他今年雖祇五十四歲，頗因連年多病，體力漸感不濟，但對新聞事業之興趣與熱情，絲毫不減當年，這是任何人和他接觸了都要受府感動的。于院長在陪都新聞界慶祝本報受獎中，以「養天地正氣，法古今完人。」十字推崇季覺先生，並勉諸體報人，這十個字，在季覺先生，足可當之而無愧。

季覺先生爲人和平忠厚，平易近人，且輕財仗義，急人之急，愛人之憂，而待人無疾言厲色；尤能獎掖後進，善予指導，凡是他共事的，沒有一個人不受他熏陶而思力圖上進。三十餘年來，他對中國新聞界的貢獻，實在沒有法子估計。近年他常常對人說：「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能看見抗戰勝利後的新中國，那時我雖死而無憾。」不錯，現在抗戰最後勝利，已經在望，可是他現經不起病魔的侵襲，而看不到勝利後的新中國了，這在他，一定是雖死而不能瞑目的！

我們悼念季覺先生，悼念他對國家的忠貞，對事業的熱情，對朋友的誠懇，對後進的愛撫。我們發承他的精神，繼續努力，使抗戰勝利後的新中國及新聞業，比他生前所想像的，更要偉大，更要進步！

#### 四、唁電雪片飛來

季覺先生逝世後，蔣委員長暨中宣部王部長等，均曾電其家屬弔唁，茲錄兩電如次：○蔣委員長長電：「大公报社轉張夫人禮鑒：季覺先生一代論宗，精誠愛國，忘劬積瘁，致耗體軀；握手猶溫，迷罔阻謝；斯人不作，天下所悲，愴悼之懷，匪可言罄。謹

電致唁，惟望節哀。」①王部長電：「大公報社轉張夫人禮鑒：季鸞先生論壇名宿，共仰高風，議政中樞，盡瘁國事。乃以積勞成疾，驟歸道山，謚言猶在，寔邇人遐，共為悲惋，良不可任，特電致唁，至冀節哀。王世杰、潘公展、董顯光魚。」

（重慶七日中央社電）張季鸞逝世後，中央組織部朱（家驊）部長、教長陳（立夫）（政治部張（治中）部長及蓉市報業聯合會等，七日均電張家屬弔唁。

（桂林七日中央社電）本市新聞界昨接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鸞在渝逝世消息後，深為震悼。記者公會及中央社桂林分社等，已分別電唁張氏家屬，咸以張氏盡力新聞事業，忠勇奮發，老而彌篤，遽爾病歿，實為國家民族之一大損失。

（上海七日下午十一時十分發專電）滬市新聞界驚聞張季鸞氏噩耗，震悼異常，全市新聞界同人特電張氏家屬致唁云：「重慶張季鸞先生家屬禮鑒：季鸞先生畢生盡瘁新

聞事業（電文脫落二十餘字），而對我留滬同人，時切懷念，更令人感奮無似。遽聞遽逝，在報界喪一巨星，在同人失一導師，悲悼曷亟，敬電致唁，尙盼節哀。上海新聞界同人叩。」七日滬中西各報咸以顯著地位刊載張氏病逝消息、履歷、遺囑，並為文紀念。中美日報、正言報、英文大陸報均刊有張氏遺像。中美日報悼季鸞先生文曰：「敬以至誠悼念中國報業先進張季鸞先生。張先生創辦報業，在國內盡了推動祖國前進的偉大責任，在國外賺得了最高崇敬與認識，我們不願意施諸一般人的讚辭，用來稱讚張先生，因為他一生盡瘁報業的努力所表現的成績，已經足以代替一切讚詞而有餘。我們深信全中國報業同人，在聽到這個不幸的噩耗以後，必將以加倍的努力，來補償張先生之死所給於中國的重大損失。」正言報稱：「張氏逝世為中國報人巨星的殞落，不僅為言論界重大損失，亦為戰時中國重大損失。」該報回憶張氏今歲元旦曾撰文論陷區及上海

等地新聞從業員爲第一等報人，慰勉有加。滬報人深恐負此期許，不敢不淬勵奮發，以慰張先生於地下。申報社評，盛讚張氏人格、學問及生平業績，並追述雙十二西安事變時，張氏曾撰文勸告張、楊二將，全篇流露愛國家、愛領袖，同時也愛張、楊的真摯情感。當局將該文印數十萬張，用飛機載往西安上空散發，感化城內將士，委座安然脫險，張氏之功，實不可沒。近四年來贊助抗戰大業，氏主張奮戰到底，呼籲團結，其信念及判斷，大部已一一實現。蒼天不佑，不待此老記者目觀勝利來臨，吾人萬分悲悼，應牢記氏之遺言，以積極精神，爲國奮鬥。

（香港七日中央社電）香港中國新聞記者公會暨外勤記者聯誼會七日電唁張季鸞家屬文云：「大公報請轉張季鸞先生家屬禮鑒：季鸞先生報界先進，道德文章，世所景仰，遽歸道山，實爲我新聞界一大損失。噩耗傳來，同人等殊深痛悼，謹電慰唁。」

（榆林八日上午九時專電）榆林爲張季鸞先生故鄉，噩耗傳來，全城悲悼，軍政長官自鄧寶珊以下俱親往呂二師下巷五號張宅弔唁。榆林張宅只留姪公子楚毫，現尚在病中，聞訊後病復加劇。榆林官民定日內開盛大追悼會。

（重慶八日中央社電）張季鸞先生逝世後，此間各報一致大字刊載，並均著論致悼，且多刊特欄紀念文字。社會人士聞悉噩耗，尤無不同聲一哭，咸謂國家民族一大損失。

（重慶八日中央社電）孔副院長七日電唁張季鸞家屬云：「大公報張季鸞先生家屬禮鑒：季鸞先生論壇宗匠，民衆導師，以口誅筆伐之功，張殺敵致果之氣。遽聞溘謝，悼愴同深，特電佈唁，尙冀節哀。孔祥熙（七日）。」

（曲江八日發專電）余司令長官漢謀、粵李主席漢魂及此間報界均紛紛電唁張季鸞

先生家屬。

二四

（長沙八日發專電）本報總編輯張季鸞先生逝世消息傳抵長沙後，七日晨各報，均著論哀悼，一致認為係國家民族無法補償之損失，新聞界並定日內開會追悼。

（桂林中央社八日電）桂林市各報聯合會，昨（七）日致電大公報張季鸞先生家屬慰唁，原電云：「季鸞先生，一代哲人，新聞碩彥，道山遽返，痛悼同深，特電馳唁。」

（桂林八日發專電）本報昨接監察院委員白鵬飛氏來函，表示願參加為壽墓紀念季鸞先生獎學金發起人之一，茲錄原函於下：「政之先生：聞季鸞先生之喪，痛悼良深。頃閱本日貴報有蔣蔭恩先生一文，擬為募集張季鸞先生獎學基金，以獎後進，用意甚善，無任贊同。弟極願參加為發起人之一，聊盡微力，以慰先生在天之靈。嗣後關於該基金事之進行情形，尚祈不時賜示為盼。尚肅，敬頌撰祺。弟白鵬飛九月八日。」

（桂林八日發專電）兩廣監察使劉侯武，昨電唁張先生家屬云：「重慶大公報張季鸞先生家屬禮鑒：季鸞先生忠貞自勵，艱苦奮鬥，三十餘年如一日。其言論風采，深入人心，海內外望風景仰。茲聞溘逝，實國家重大損。公誼私交，同深哀悼，謹電慰唁。弟劉侯武肅（七日）。」

（桂林九日發專電）本報全體職工於昨（八日）晚七時在星子巖工廠內舉行追悼會，遙祭本報故總編輯張季鸞先生。祭臺佈置莊嚴肅穆，中懸張季鸞先生遺像，旁懸一聯為：「大文開時代，正氣壯山河。」橫幅為「精神不死」四字，臺之四週，滿架松柏，祭桌上並奠以香花素菓。當推王文彬、蔣蔭恩代表主祭。獻花圈、敬酒，全體默念三分鐘誌哀、宣讀先生之遺言，並由王文彬、李清芳報告先生生平事略，聽者無不感動，泫然淚下。最後臨時提議：○聯合渝港兩館同人發起壽墓「紀念張季鸞先生獎學基金」，

在國內著名大學新聞學系中，設置名額，培植新聞人才。③編印先生文集，以留紀念，常經全體通過。

（西安九日上午三時專電）張季鸞先生逝世消息傳至此間後，各界無不痛惜，識與不識，同深悲悼，尤以士紳爲然。除各電唁外，熊主席（斌）九日晤記者，垂淚而言，略謂：「季鸞先生一生對輿論曾經最大的努力，國家政治，得益不少。自抗戰後，報館一遷再遷，始終奮鬥，今勝利將臨，而彼不及見，曷勝遺憾。彼身體本弱，年來住渝，在敵機轟炸下，更爲努力；其堅苦生活，時爲佩念，本人在陝，於其臨終不獲一面，尤爲難過。」又胡宗南約晤記者，首稱：「季鸞先生遠逝，真是國家的損失。」續謂：「今春得書，謂將回陝，行館已爲準備，今竟不得再見！」言之嘆息良久。又陝西臨參會九日開四次大會，議長提議電唁，全體通過，署名印發。又通過發起各界追悼會。又紳商

發起追悼會，已有數起，將來或聯合舉行。

（西安九日上午四時電）西安各報均著文追悼張季鸞先生。西京日報略謂：「他不僅有見重於世的名筆，更有崇高的人格，對政府設施善意批評，對社會黑暗嚴重指斥，不作庸流之言，以圖銷路之廣，實係報人典型。」西北文化日報謂：「中國自有報紙以來，言論之有影響，遇國家有大事，而能臨危不亂，被中外尊崇，惟有大公報。張氏不以失敗灰心，不以利祿動性，操守自持，精神不死。」新秦日報謂：「大公報早即有士人報之稱，茹苦經營遂底於成。張氏對時局認識正確，估計適當，尤以博識遠慮，故能言之不偏。」該文長千三百字，情感充溢，精闢動人。略言：「張氏之逝，爲國家民族重大損失，訂交三十年知之最切，特悲懷，述其大略。先生以書生論政，固已久爲人所敬仰，但其大議論大計畫，因格於情勢，限於環境，爲國人所未盡悉。年來於各具體問

題，對中樞當局，或犯顏直諫，或痛哭陳詞，其中所收效果，更不可以數字計；而當局亦能諒其純潔無私，故能認為諍友。先生三十年前，以一記者獻身社會，今仍以一記者死去，心口如一，言行相符，報人最堪欽式。並開會建議當局，採取開明新聞政策，今言猶在耳，而志尚未伸，深望賢明政府，特加注意，以報先生。」最後謂：「其學有自，幼爲關中大儒劉古愚門人，秦人重經學，深得其氣節之微旨，故能卓爾獨立。及接近政府，而不爲政權所宥，始終努力本位事業，以視一般招之即來，揮之即去者，直不可以道里計矣。」

（重慶十日中央社電）中國新聞學會理事陳銘德、周欽岳、監事羅承烈等向中國新聞學會及重慶各報聯合始員會提議，由兩會共同發起請求政府公葬張季鸞。

（曲江十日下午五時發專電）曲江同業爲追悼張季鸞先生，擬日內出特刊，登載紀念文字，現正在集稿中。

## 五、重量悼念文

### （一）于右任：悼張季鸞先生

季鸞先生逝世後第二日（九月八日）于右任院長即發表一悼念文，由渝、桂兩版大公報以特載方式刊於原社評地位，全文如下：

余視張季鸞先生於其獨留也，見其志湛然，隱露英雄氣骨之色，因念國家正在百事艱苦中，胡爲哭先生之死也？參書禮數事，以雪余哀，且告世之親愛季鸞先生者。

記先生五十五生日，余贈以詩云：「榆林張季子，五十更風流；處世忙人事，時時念國仇。新羅翻法曲，大筆獨神州，君莫論民立，同人盡白頭。」先生初助余籌民立報，英思卓識，天字開張，三十年來，交情歷歷如昨。先生近嘗喜哀曲，以次文明時代，故余詩及之。今悼先生奄忽治者希世之悲風乎！

先生十五之年，由山東渡嶺中，其時咸陽劉古愚師以大儒講論經世之學，從學者衆；罷講後，見先生英爽